



# 银装素裹 巧夺天工

## ——江西古代银器



胡海燕

(江西新余市博物馆)

自然银大部分伴生在铜、铅、铁、镍的硫化物矿床中。在自然界里,银和金通常以“姐妹矿”形式产出,多数金矿既有金又含银。因而,在黄金饰物中往往含有一定数量的白银。由于银在自然界不以单质形式存在,所以人类先认识了金,然后才发现了银。银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延展性,其延展性仅次于金。由于这一独有的特性,人们最早用来做装饰品和餐具。同时,因为银的取得量非常少,又被历代比作“白金”,珍贵程度曾经比黄金还要贵,因而又曾作为货币流通。

江西银制品的制作和使用具有较长的历史。考古发掘证实,春秋时期江西先民就懂得了银矿采冶金银器和银器的制作。2007年靖安东周墓葬出土的金质族徽,就是一件金银饰品。它应当是一件金银自然伴生的金银饰物。其表面分里中外三圈装饰龙形图案,各区之间采用环形锯齿状纹间隔。里圈为三组筒体龙纹(也可称窝纹),中圈五组龙纹,外圈七组龙纹。龙纹采用背面捶揲技法,把卷尾龙的上、下颚、眼睛、眉毛刻画得惟妙惟肖。完美的设计、程式化的构图和成熟的捶揲技术,使得这件堪称国宝级的文物,成为迄今发现的同时期最繁复的金银饰品,是金银饰品的杰出代表(彩版一,1)。这段时期,我国一些战国墓葬中出土有许多银饰品。湖南长沙近郊出土过楚怀王二十九年题铭的银器皿,河南辉县固围村也发现过战国时期的包金镶玉嵌琉璃银带钩,山东曲阜鲁国故城战国墓中出土有猿形银饰,陕西神木纳林战国晚期匈奴墓中出土的银虎银鹿、银杯等。内蒙古杭锦旗匈奴墓出土的五件银器,工艺十分精湛,是匈奴金银器的力作。而山东淄博窝村西汉齐王刘襄墓中出土的西汉初期墓葬的130余件银器,是秦代物品。其中一件秦始皇三十二年(公元前215年)造的鎏金刻花银盘,内外篆刻龙凤纹,布局疏密得宜,线条流畅活泼。此时金银作工的器物,主要还是铜质或铜锡合金质地的错金银器物。

汉代,中国的金银器制作进入到成熟时期,是我国著名的多金王朝。随着张骞出使西域和丝绸之路的打通,中西交流日益密切,金银器成为一种独立的工艺门类,银器制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。许多异域风情的银器制品的出土,表明金银器的制作受到了西方及中亚地区的影响。史载西汉皇帝对臣下赐金达一百多次,多则几千斤,少则几十斤。东汉时期,金银器在皇室和高官显贵中有了较多使用。如《太平广记》(卷二百三十六)载光武皇后之弟郭况:“累金数亿,家僮四百人,为金为器,铸冶之声,彻于都鄙。”汉代金银器的制造和使用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局限性。如《汉书·贡禹传》(卷七十二)载:“臣禹尝从之东宫,见赐杯案,尽文画

金银饰,非当所以赐食臣下也。”就是说,一般臣下对有金银纹饰的器物都不敢用,更何况金银器了。一些王墓中出土了精美的错金银器皿和珍贵的银缕玉衣等。中山王刘胜墓就出土了小金币40枚、小金针、银马具等80余件。广东南越王墓出土金串珠、金银、金带钩等。此时的金银器制作多采用掐丝和焊缀金珠等技法。

西汉汉代的采矿业有了一定发展。在南昌、修水、萍乡、铅山和南康等地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。一些地方的采金状况也多有记载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鄱阳县“武阳乡右十余里有黄金采”。晋宋以后的文献记载,以及近代矿物学的野外勘探证实,汉代鄱阳采的是乐安江中的沙金,系由武夷山脉南岭花岗岩所风化而来,经雨水冲刷积于河中,沿乐安江分布于德兴、乐平、鄱阳等县境内<sup>①</sup>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:“豫章出黄金”。宋应星《天工开物》:“金……江西乐平、新建等邑,皆平地掘深井,取细沙淘炼而成”。司马迁又说,“然堇堇物之所有,取之不足以更费”。说明采金所得不多。金银多共出,可以理解产金也同时产银。只是此时的金银开采有限,还不足以形成一定的规模,甚至是入不敷出。不过,攫取沙金和“平地掘深井”淘沙金冶炼,明白告诉我们当时采冶金银的基本方法。

由于汉代金银器物使用的严格局限,在江西的汉代墓葬中,我们尚未找到有关随葬金银器的实物资料,也未发现金银器的窖藏。所以无法准确分析汉代江西金银器的制作及使用情况。

三国以后,特别是南北朝时期,金银器的制作广泛使用掐丝、捶揲、镶嵌等技法,开始对金银器物有了规范名称和具体使用用途。金银器制作并从官府的单一控制发展成为上层社会的普遍现象。许多贵族开始自己制作金银器,以致皇帝亲自下诏禁止。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诏曰:“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,有私养沙门、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,在其家者,皆谴诣官曹,不得容匿”。豪门富贵私造金银是非法的,但却为金银器的普及和工艺的提高,提供了机会。

文献记载,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,豫章城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镇。在青瓷烧造、漆器、纺织、铜器制造和金银首饰的生产工艺方面都有很大发展,一度成为江南的冶炼、纺织、造船和商业中心。前面所叙的银山银矿就是江西已知最早开采的银矿,在南北朝时期就引起了朝廷的重视。并因采银之故,陈文帝天嘉年间(560~566年)改乐安为银城县,后来才更名为德兴县。这是江西明确有银矿采冶的开始。

唐代是我国银器制作的繁荣时期。由于经济的高速发

展和受外来文化的强烈影响,金银器制作也得到空前的发展。但是,也仅限于皇室和高官显贵之间享用。“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”,追求延年益寿,渴望长生不老,精美的金银制品成为贵族生活的等级标志。唐代的金银器主要用于买官邀宠、赏赐大臣、对外贸易、统治集团内部的贿赂以及布施等几个方面。其制作分为“官作”和“行作”两类。金银器制作有了十足的精神动力,各地出土数量相当丰富。1970年,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了270余件金银器;1983年,江苏丹徒丁卯桥窖藏出土银器956件;1987年,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金银器121件。这几批唐代金银器富丽堂皇,气势恢宏,是我国极重要的发现,数量和品种之多,工艺成就和艺术价值之高,都可称得上全国之最。特别是丹徒出土的银器,代表了唐代南方地区杰出的工艺水平。

唐代的江西,矿产业普遍发展。据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载,此时的洪、饶等州都在开采银、铜、铁等矿物。饶州银山银矿每年出银十万余两,收银山税7000两,占唐朝银税总数的一半。银矿物丰产的同时,也带来了银器生产制作的鼎盛,众多的具有地方经济中心的集镇逐渐形成。著名的吴城、河口、临江、永和等镇的商业贸易盛极一时。瓷城永和镇已经形成“六街三市”的商业格局,一系列的行业街区如瓷器街、莲池街、茅草街、锡器街、鸳鸯街、米行街,悄然兴起。

宋代,都市商业高度发达,社会奢侈之风盛行。金银器制作在唐代基础上,有了进一步发展,而且更加商品化。唐代形成的皇家和中央官府作坊等被继承下来,地方官府作坊、私人作坊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,并成为宋代金银器制造的主体。金银器已为社会各阶层所普遍使用。不但皇亲国戚、王公大臣们尽情享用,上层庶民和酒肆妓馆也大量使用银质饮食器皿和装饰品。如《东京梦华录》(卷五):“其正酒店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,便敢取与三五两银器。以至贫下人家,就店呼酒,亦用银器供送,有连夜饮者,次日取之。诸妓馆只就店呼酒而已,银器供送亦复如是。其阔略大量,天下无之也。”宋代人家使用金银器可见一斑。

随着德兴银城、上高蒙山等银矿的崛起,江西宋元采冶银矿,以及铸造银器业迅速发展。有专家对我省出土的金银器物,做了详细统计<sup>②</sup>。

江西宋代出土的珍贵文物,共有5座墓葬和2个窖藏,共有27件,其中金器11件,鎏金银器16件。其中以金银首饰占多数,种类有发钗、发簪、霞帔坠子、各种挂饰和带版等,其次为金银器皿,如注子、盘、碟和碗等。当然,相对于全省出土的一般文物金银器的数量,这个统计不是最完整的。

1978年,遂川发现的北宋刑部尚书郭知章墓,出土了各类鎏金银具14件,以及一批铜器。还有安义的南宋时期李硕人墓葬、萍乡的宋代窖藏等,都出土过为数不等的金银器饰件或日用器皿。1989年,德安南宋周氏墓也出土了一批银质发钗、发簪、霞帔坠子以及香盒等。

1975年,星子县发现宋代窖藏,出土一批鎏金银质碗、盘、碟、杯等<sup>③</sup>。云头纹银杯,口部、足部篆刻一圈金钱纹,通体捶打变形如意云纹。柳斗纹银罐,以宋代瓷器柳斗纹罐为蓝本,造型圆润丰满,通体捶打柳斗纹饰,工整、细致、精美、繁复(彩版一,3)。双系银洗,通体素面,造型奇美。八菱花乌

纹银盘,口沿及盘壁呈八菱莲瓣形,盘沿处捶打一圈卷草纹,盘底分别篆刻莲花鸳鸯、桃花鹦鹉、绣球喜鹊、桃花绶带鸟、桂花鹦鹉和鸂鶒荷花等纹样。银盏托,盘面捶打成二层台状,最重要的是,在圈足口沿处篆刻“仵家记”、“椿桂堂”等字样。显然这是银器制作者的商号标志,表明了这批银器是家庭手工作坊的产品。

1978年乐安县介溪镇发现宋代窖藏一处,出土银质器皿100多件<sup>④</sup>。是江西宋代一次出土银质器皿最多的发掘。银器品种有盘、盏托、匙、箸、杯、瓶、壶等。双鱼纹鱼盘,共出土38件。盘沿篆刻一圈卷草纹,盘底篆刻双鱼荷花蔓草纹,每件圈足中部均篆刻有楷书“仁”字,另发现7件在“仁”字旁边刻划“收”字,7件刻“玉”字,3件刻“林”字。表明这批银器是专门为一个家族的不同小家庭定做的日用器皿。

还有,在南昌青云谱出土的一批银器也十分精美。菱形刻花银盘,器物造型做成四曲菱花状,盘沿出篆刻菱形圆点纹,盘底捶打凸起的四曲菱花窗,窗内刻有《踏沙行》一首,分十行,每行字数不等,共计61字。可能是当时民间艺人说唱所填之词。四菱花窗之外捶打人物图案,图案与词意相呼应,一新科状元头戴乌纱,身穿袍服,骑着骏马在手持“天下状元”旗帜和伞盖的随从拥护下,前往一楼阁。这是宋代江西社会文化发达、文风鼎盛的写实,也是一件十分难得的宋代建筑艺术佳作(彩版一,2)。

元代的银器出土较少。主要以德兴银城和新余渝水区出土物为代表。由于两地分别是银城银矿和上高蒙山银矿的所在地,所以这两批银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当时江西地区银器制作的水平。

1985年,德兴市银城东郊虎头山基建工地发现一处银器窖藏。出土8件银器,种类有执壶、瓶、盘等日常生活用品。器物采用捶打成形,造型优美、线条流畅,银地金花,在器物的不同区域装饰纹饰,腹部的菱形开光内还篆刻不同的人物故事,纹饰风格细腻舒展,图案华丽丰满,是不可多得的元代珍贵银器(彩版一,5)。1982年,新余渝水区出土的一个元代银器窖藏,出土银质器物8件,均为鎏金银器。其中一件银盘采用圆雕和高浮雕技法,使用压模、捶打、鎏金等工艺,将银盘从口沿到盘底装饰多层图案。口沿有菊瓣纹,盘壁有带叶缠枝菊花,盘底心则装饰有绶带蝴蝶一对(彩版一,4)。

总体看来,江西宋元的金银器器物设计新颖、造型优美、工艺制作精湛,铸、刻、雕、焊技术都得到了提高。装饰风格在唐代基础上变得素雅而富于生活气息,具有很强的写实性。格调意趣清新,充满诗情画意,与宋代的时代精神“不在马上而在闺房,不在世间而在心境”的美学总体风格相一致。题材有花鸟鱼虫、楼台亭阁、植物纹样、吉祥图案等各种纹饰。

进入明代以后,福建、浙江、云南已成为最重要的产银地。尤其是明中叶以后,随着封建经济内部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,对贵金属的需要日益增加。于是,嘉靖、万历年间,政府大肆开采银矿。不过,由于官矿经营的腐败,各处矿冶却反而趋于衰落。在官银矿衰落的同时,民间采银日渐增多,“盗矿”时常发生,上高等地的多处银矿都遭到封禁,江西

(下转第159页)

闷,要不时面对战友的牺牲,还要时刻提防特务的各种阴谋诡计。

就是在这样的复杂险恶孤闷的环境中,廖承志在集中营里泼墨挥毫,吟诗作画。其作品有水墨、水彩、漫画,还有不少诗歌、短信,以鼓励战友的斗志。

廖承志在集中营画的这幅“雪竹图”是特地赠给难友漆裕元的。漆裕元是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黄道发展的特别党员,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中学教员,因为抨击国民党消极抗日的政策,1940年12月被关进马家洲集中营。在狱中,他与廖承志只能在上卫生间的短暂时间内见面,用英语交流情况。廖承志将这幅画送给了漆裕元。新中国成立后,漆裕元曾先后任江西省文化局副局长、省政协常委。1953年,他将保存得完好无损的画作捐给了江西省博物馆。

当我们把“雪竹图”放回到那个特定的时空来欣赏它时,看似平凡而简练的一个严冬竹雪自然景象,陡然变得恢宏博大起来,画面中阴暗的背景使我们联想到那个暗无天日、人如蝼蚁的时代,那种大雪压顶的窒息场面,使我们闻到了那个时代丑陋而卑微的气息。

加上画面的诗题,这幅画景所表现的静态时空变得灵动起来,简单的层次有了丰富跌宕的情节,扩展了无限的意境,在厚重积雪的重压之下,翠竹不弯不折,英挺坚直,直入云霄,毫无颓废披靡的老态;在自然世界的严冬里,竹叶虽然经冬不落,但也会有些萎败枯黄的气象,而在这幅图中,

竹叶却清新翠绿,如春天生机勃勃的新叶;一般山水画中都以人物为灵魂的主人,景物为思想的客体。而此画中却以翠竹为灵魂的主体,“林间叟”反而为客体。一句“借问林间叟,如我有几人”的诗题,使画面产生了灵动的戏剧性效果。茅屋中,透露出一丝光明,然而,大雪压顶,令人窒息,老翁只好从茅屋中蹭出来。他为何惶惶然走到翠竹之下?为何彷徨?为何伫立之际,他的体态和表情又呈现出倔强和坚毅的气质?原来,他的心灵感受到了翠竹的拷问,他从翠竹的劲节中得到了力量,得到了该怎样继续前行的答案。

显而易见,数竿翠竹是凛然正气的化身,是当时身陷囹圄的廖承志的精神寄托。

从廖承志的“雪竹图”可以看出,廖承志同志坚贞的革命气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,犹如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铁骨铮铮的凛然正气。廖承志同志是一位多才多艺、光明磊落、襟怀坦白的革命理想主义者。

“雪竹图”是廖承志同志坚贞不屈的崇高气节的历史见证,具有重要的革命历史文物价值。

注释:

漆裕元:《吴建业在马家洲集中营的部分情况》,《江西文史资料选辑》(第21辑),第64页,江西省委党校印刷厂版,1986年。

(责任编辑:刘慧中)

(上接第163页)

采银业失去了昔日的风采。总的来说,明清时期,江西的银矿开采不多,而且多是旋开旋闭,兴废不常。

明代银器制作创新不多,主要精湛的艺术品多出自王宫贵族的陵墓之中。明宣德年间,铸造局专门制定了工匠制度,规定各地工匠需轮流到京城服役三个月,专门为宫中制作金银器物,从而更加促进了金属工艺的发展。一整套与礼制有关的金银使用制度,也在明代得到完美诠释。《大明官制·礼部》载,明太祖朱元璋就曾规定:公侯与一、二品官,酒注、酒盏用金,其余用银;三品至五品官,酒注用银,酒盏用金;六品至九品官,酒注、酒盏用银,其余用瓷;庶民百姓酒注用锡,酒盏用银,其余用瓷。用黄金制成的酒爵,即使有品级的官员,均不得僭越。

明代江西分封有宁王、益王、淮王三藩。三藩在江西大肆攫取民脂民膏,生前极尽奢华,死后锦衣裹尸。藩王墓葬出土了众多的精美金银器物<sup>①</sup>。

1958年发掘的益王朱厚焯夫妇合葬墓,在墓主、元妃和继妃的墓葬中共出土金银器208件,不但是各地出土金银器物之最,而且金银器品种繁多,造型多样,纹样精美。1982年益定王朱由木夫妇合葬墓中出土金器和鎏金银器12件。2001年,南昌华东交通大学校园内发掘的宁靖王夫人吴氏墓葬,出土了较多的金银饰品,其中有金银冥币共64枚。这几批银器主要是女性日常装饰品,以及随葬冥器,有鎏金银发簪、鎏金银插和鎏金银凤冠和银钱等。鎏金银凤冠镶嵌有精美的展翅凤鸟和宝钿花。

这些藩王墓葬出土的金银器,反映了明代皇宫贵族金银使用等级,显示了明代金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。总体特点是采用捶制方法制成器物胎体,主体纹样采用捶揲手段,使器物突出浮雕特点,然后使用篆刻技法处理器物细部,并结合累丝工艺和镌镂技法,加强器物的层次感;宫廷气息日益浓厚,制作风格趋向华丽、浓艳。或珍珠点翠,色彩斑斓,或精雕细琢,巧夺天工。

明中叶以后,中西贸易逐渐频繁。西方商人大量采买中国的丝、茶、瓷器等,大都使用白银支付,极少以物易物。因此,充足的丝、茶、瓷器,换取了丰厚的白银。根据东印度公司的记录,自康熙二十年(1681)到道光十三年(1833年)153年间,欧洲船只输入中国的白银,总计约7000万两以上。加上菲律宾和日本等地流入的白银,总共有几亿两之多。中国的采银业自然走向衰落,江西的白银采冶、铸造同样走向了没落阶段。

注释:

① 许怀林:《江西史稿》,江西高校出版社,1993年。

② 肖发标:《华贵绚丽——江西出土金器珍影》,《南方文物》2006年第2期。

③ 胡丹:《轻薄精巧 素雅秀丽——谈宋代银器皿》,《南方文物》1996年第1期。

④ 许智范:《金枝玉叶的最后归宿——明藩王墓》,《手铲下的文明》,江西人民出版社,2003年。

(责任编辑:刘慧中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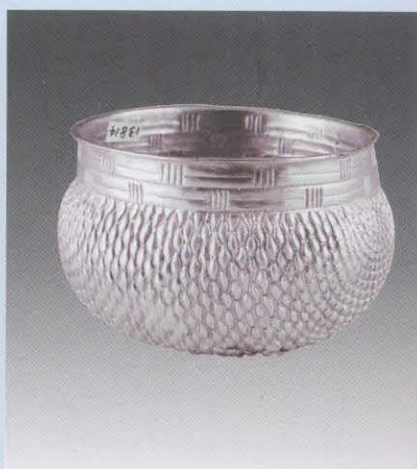
# 银装素裹 巧夺天工：江西古代银器



1



2



3



4



5